

華齡出版社

名 人 死 亡 之 謎

朱天紅編著

名人死亡之谜

朱天红 编著

华龄出版社

名人死亡之谜

朱天红 编著
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

(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8号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32开 8印张 192千字

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

北京 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000册

ISBN7—80082—000—9/I·1

定价：3.60元

目 录

- 孙中山病逝纪实 董帮安 哈笃信 (1)
宋庆龄的最后岁月 张戒·乔恩·哈利戴原著 (13)
傅伍仪·张爱荣 节译

魂系天山

- 毛泽民在新疆遇难前后 天红 肖岸 (26)
萧红之死 郭 宛 (63)
盖叫天之死 江城柳 (78)
翁美玲之死 李青葆 (99)
伟人之死

- 列夫·托尔斯泰的最后时刻 曲擎天 (135)
肯尼迪遇刺之迷 柯 施 (149)
萨达特之死 亚 洲 (158)
独裁者的归宿 王福近 (177)
拿破仑冤案 邵 播 (202)
林肯被刺前后 陆 圆 (228)
名相之死 马永堂 (239)
死在浴盆里的女富豪

——克莉丝蒂娜 (247)

孙中山病逝纪实

董邦安 哈笃信

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，革命伟人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溘然长逝，天不陨遗，巨星陨落，邦国不幸，举世悲伤。孙中山1924年11月北上，四个月后遽被夺去生命，其病情为何来得这样突然，恶化得如此迅速，中间的变化、施治情况又如何？此类问题向为大家所关心，但六十年来，不少文章叙述至此，每多语焉不详。近从有关档案和资料中，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新材料，爰节其事以告，或为素所关心者所乐闻。

北上病发

1924年10月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，幽禁贿选“总统”曹锟，由段祺瑞执政，北方出现了段祺瑞、冯玉祥、张作霖三个虚假联合的局面。其时，受革命潮流影响的冯玉祥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时局大计。

当时，第一次北伐已经开始，孙中山驻跸韶关，公务丛集，日理万机，颇感疲惫。但为了“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”，“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，”毅然决然决定即日北上。

11月13日，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，将北伐军政事宜移交谭延闿负责，令胡汉民留守广州，代行大元帅职务。待一切布置就绪，方于11月13日离粤北上。

时军阀割据混战，南北交通梗阻，孙中山乃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（后改名中山舰）先抵香港，旋即旋搭日本邮船春阳丸至上海。11月22日，又乘日轮上海丸离沪，绕道日本长崎、神户，再改乘北岭丸于12月4日到达天津。

在短短的三个多星期里，孙中山每到一地不是忙于接见各界人士，招待新闻记者，参加群众大会，便是埋头处理公务，起草发言，拟订方案。这种席不暇暖、废寝忘食的生活，加上气候多变，海途颠沛，使孙中山的久病之身渐感不支，唯靠一股为民谋利的精神顽强支撑。

12月4日清晨，北岭丸始抵大沽口外，孙中山在船上接见了乘小艇前来迎接的汪兆铭（精卫）、孙科等，听取了关于京津及各方近况的报告。中午12时，船才徐徐泊于天津法租界码头，受到天津各界一百多个团体和二万余群众的热烈欢迎。孙中山兴致勃勃地会见各方代表和群众，下午一时始入驻入日租界行辕。稍事休息，即接见各方代表和答谢各将领的欢迎，随即又强打精神，偕随员驱车至河北曹氏花园拜访张作霖，交谈约两个小时之久，其时身体已感不适。回到行辕，寒热骤作，肝痛时烈时止，历年积劳所致之疾，一朝迸发。

扶病入京

孙中山病发，夫人宋庆龄及随行人员万分焦急，急忙延请德国医生施密特诊治，诊断为恶性感冒；再请日医检查，又误诊为胆囊炎。医生叮嘱暂时要停止一切活动，静养调理。这时，孙中山虽精神疲惫，肝痛时有发作，但尚能读书看报。第二天，孙中山给段祺瑞发了一个电报，谓：“本拟

7日晨入京，籍图快晤，惟因途中受寒，肝胃疼痛，医嘱静养三两日，一俟病愈，即行首途。”由于他自己的病情颇为乐观，于是带病在卧室内接见京、津、奉三方面要人。12月18日上午，又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、许世英，晤谈良久，当得知临时政府已通知各国使节，要“外崇国信”，即“尊重”历来条约时，孙中山愤怒地责问道：“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，你们在北京，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你们要升官发财，怕那些外国人，要尊重他们，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”，因受刺激，是日下午，孙中山体温骤升，呼吸急促，脉搏加速，经医生诊治及大家力劝，他才暂缓行期，少见宾客，稍事休息。

12月28日，段祺瑞来电相催：“时局未定，庶政待商，务祈速驾，以慰众望。”其间，北京各团体亦纷纷代表到天津敦请入京。抱着“吾人之救国，义不容缓”之信念孙中山当即致电段祺瑞，略谓：“两日以前，所患略减，与医生商酌，决定于31日入京，惟养病期间，仍当暂屏一切，以期速愈，知关远注，谨以奉闻。”

12月31日上午10时，孙中山扶病偕夫人及随行人员乘火车赴京，临上车时向前来送行的民众发表书面讲话，大意是：中华民国主人诸君，兄弟此来，承诸君欢迎，实在感谢。兄弟不是为争地位，不是为争权利，是特来与诸君共同救国的。

在北京的学生、民众10余万人，知道孙中山要来，早已在前门车站等候，把车站挤得水泄不通。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担心秩序难以维持，不能尽到保护之责，遂驱车奔到永

定门车站迎候，想请孙中山先生在那里下车，以策安全。当时孙中山躺在卧铺上，面容憔悴，健康状况已很不好，听明鹿钟麟的来意，孙中山除了感谢对他的关注外，坚定地说：“我是为学生、为民众而来的，我不能只为了个人安全打算，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。请不必担心，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，学生们和民众们即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。”下午4时，车抵前门东站，只见月台上黑压压的，欢迎人群秩序井然地站立着，手中数不清的红绿色小旗在寒风中瑟瑟作响，孙中山在随行人员的搀扶下，走下火车，徐步走过欢迎的行列，含笑答礼并同学生、民众谈了话，然后才乘汽车赴北京饭店。

入院前后

孙中山抵京后，即延请协和医院医生狄博尔会同施密特等进行详细检查，结果一致诊断为最烈之肝病，建议马上施行手术，否则不但不能探明病源，还要贻误病情。孙中山本人并不知道病情的严重程度，因此没有同意马上施行手术。

第二天正是1925年元旦，段祺瑞派其子段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向孙中山贺年。孙中山挺着精神亲自接待，并力述个人病体未愈，不能多为劳动，大约需要经过十几天以后，才能够与段祺瑞晤面，解决国事。但孙中山对于临时政府的动向仍很注意，对北伐军的进展情况尤为关心。由于各方前来访谒的人很多，因精力不济，孙中山对于接待颇感辛劳，又不能谢绝各方的热情，于是采取了一个派定专人分别接待的办法。

尽管这样，孙中山的病情不仅不见好转，反而日甚一

日。1月23日，内科医生克礼发觉孙中山眼球内出现黄晕，知道肝脏之脓液已侵入其他部位，认为非动手术不能治疗。孙夫人及随从人员商量后，乃请中、英、美、德、俄、日各国医生会诊，一致确认，除动手术外，别无他法。但不少医生认为先生年已六十，对手术过程能否确保无虞，颇多踌躇。

1月25日孙中山的病势进一步转剧，26日益形恶化。协和医院外科医生急忙和孙夫人及汪兆铭、孔祥熙商量，认为已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了。孙夫人等未敢遽作决定，再诸决于孙先生本人，孙中山慨然表示同意。于是，这天下午3时，住进协和医院，由该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主刀，孙中山的好友、院长刘瑞恒和克礼医生等在旁照料。孙科、孔祥熙、宋子文、鲍罗廷等人在手术室离手术床较远的一隅观察，为怕孙夫人情绪不能自制，请她在邻室等候。

打开腹腔后，只见肝脏已坚硬如木，生有恶瘤，经切片检验，才知道孙中山患的是肝癌，且已是晚期，为不治之症。消息传出，众人震动。当晚，汪兆铭给上海发了一个急电，大意谓：“总理已在医院开刀，发现了极危险的状态，望诸友速来。”上海同人杨庶堪、李烈钧、张人杰、孙科、庞青城、周鳌等接电后心急如焚，遂乘定海轮直达青岛，再换火车从胶济路入京。

2月2日一行人抵北京，当即驱车直至协和医院。张人杰、孙科等见到了李石曾、吴雅晖、汪兆铭等。汪兆铭上前迎接时对张人杰说：“孙先生之病，诸西医已宣言绝望，前二日其势甚危，今日少缓，先生急欲见君”于是带张人杰、孙科进孙中山病室。孙中山看到人杰原本单薄的身体更加清

瘦，满面病容，便关切地说：“劳汝久病之人远道来探，心甚不安，”言时泪下。张人杰忍痛劝慰，孙中山又说：“吾病无碍，只须休养，”反而叮嘱身旁人为张人杰在同楼东隅安排一处病房。

劝服中药

孙中山见到张人杰、孙科等人后，极度兴奋，当夜脉搏加快，体温骤升至39℃。他极烦躁，因此从2月3日起即谢绝见客。时李石曾、汪兆铭、吴稚晖，张人杰等人聚首时，相对泫然。李石曾说：“先生之病，西医虽言绝望，尚有中医可医。”

他的主意得到大家的赞同，于是立即延请北京名医陆仲安等前来诊治。诊脉后，一位姓肖的医生颇为悲观，说“如能度过立春，当再拟方”，实际上已感到没有办法。唯陆医师说“尚有三成希望”。但孙中山早就表示，不愿服用中药只有待到西医明确无法医治时，才考虑服用中药。因为孙中山本人是西医，恐怕中西药性互相冲突，更主要的是，他认为住在协和医院服中药，会引起院方误解，以为是对他们不信任；而瞒着院方服用中药，又违悖以诚待人之道。

这使孙中山左右的人感到十分为难，如果据实说明西医对他的病症已告绝望，怕孙中山闻后突然失望，精神上受刺激而生变异；不说明吧，孙中山又坚决不服中药。大家商量结果，决计不言，只说此等中药与西药并无冲突，且西医亦赞成服中药，但一起反复力劝，均无结果。2月3日，孙中山的脉象渐见衰弱。大家又和陆仲安医师商量，他考虑再三，说：“先试服人参汤数日，再进药亦可。”即拟入参、

麦冬汤（人参2钱、麦冬1钱），劝孙中山服用，说：“以人参代茶，并非服药。”孙中山因过去服过同人自制的高丽参神，竟至心脏停跳，是以执意不允。2月4日，因无法劝服，遂改用参1钱加麦冬汤和于食物之中，让孙中山吃了。其后又连吃两天，脉象转佳，诸象较有进步。这时候，张人杰才把真情向孙中山说了：“予等无状，以先生脉象渐弱而先生又不允服参之故，竟以参和入食物欺先生而偷进之矣，幸而见效，先生较为健康，不然，予等罪大也。”孙中山听了，不仅没有责怪大家，反而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要再和入食物，让我自己喝好了。参汤本来是可以代茶喝的，并非是用中药治病。”

但以后3日，虽连服参汤，病情却不见起色。陆仲安医师检查后告诉众人：“先生舌胎较润，脉反转弱，非服黄芪、党参大补剂不可，仅用人参已不足以治病了。”左右据实相告，不想孙中山抱定非出院不服中药之宗旨。大家没有办法，只得将黄芪和羊肉（黄芪1两、羊肉4两）一起熬汤，对孙中山说：这是食品，不是药，孙中山这才允服。服后脉象大佳，第二天（2月11日）又服用黄芪冰糖汤（黄芪2两、冰糖少许），2月14日服黄芪4两（冰糖煎服，脚肿略消，惟脉象转弱，舌胎亦无进步，大家又开始担心起来。

出院前后

在此期间，西医主要采用当时西方治癌最先进的方法—镭锭治疗，但也仅能减少痛苦，苟延时日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2月14日，协和医院的医生为孙中山作了仔细检查

后宣称，病体至多只能拖延七天。大家听了心情更为沉重，和陆医师商量后，好言劝孙中山进参芪，不想他闻之大怒，脉搏升至一分钟240余次。这时孙夫人上前劝慰先生不要发怒，说发怒有损健康，孙中山这才平息怒气，脉搏跌至一140余次，但呼吸仍很急促，大家于是找孙夫人商量，自孙中山病情沉重以来，孙夫人日夜服侍，从没有好好睡过觉。在服药医治过程中，每每遇到这样的难题，孙夫人总是巧妙地予以解决。这一次，只见她拿起参汤果断地递与先生，孙中山亦不详询，即一饮而尽，顷刻，脉搏复回至100—110次，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并对孙夫人的勇气深表钦赞。

不料二月十五日晨，协和医院的医生在照例检查病情时，孙中山因术后病情每况愈下，问医生：“我究竟患了什么病？几时才可以痊愈？我也是学医的，请你们如实告诉我。”医生难以正面回答，犹豫良久，才婉转地说：“请孙博士准备遗嘱吧。”这是医生第一次在孙中山面前表示病已不治。孙中山虽早有所料，听后仍很激动，于是要求立即出院。这时李石曾、张人杰、汪兆铭等告以外面风大，要求待次日再迁移。其实他们是要和西医商量，这时出院，途中是否会发生意外，西医认为很危险。大家又将这情况询问陆仲安医师，陆医师诊脉后说：“先生病情今后如何发展不敢断言，但即日移动，必无危险，敢负全责。”考虑到孙中山决意要迁，大家才最后下定出院的决心。当将这一决定告诉协和医院时，负责治病的医生当即出示二纸签名通告：其一，迁移途中发生危险，概不负责；其二，先生生命无生存希望。

次日（1925年2月16日）中午12时，协和医院医生给孙中山注射樟脑玛非，然后用病床抬先生上医院特地预备的汽

车上，由孙夫人、孙公子、德国医生克礼及一女看护随车照料。北京执政府各部、各军事单位、群众团体、国民党人士均派代表到医院门口迎接，百余辆汽车尾随病车，缓缓驶往铁狮子胡同行辕。行至岔路口，所有随行车辆从另一条路先到行辕，各代表及国民党同人纷纷下车至行辕内走廊上，列队迎候。孙中山下病车时，对这些迎接者颌首注目，以示感谢。

这天，孙中山体温正常，精神尚佳，并未因迁动而受影响，大家如释重负。而孙中山因久卧床席，颇感不适，想起立行走，稍事调节。大家怕他身体虚弱，发生不测，于是反复劝慰，孙中山这才不再坚持。但后来因更换病榻，起坐大便，过分劳累，脉搏加速，继而气急，势颇危险，过了好一会才稍稍平缓。2时许，请陆医生入诊，陆言：“脉搏较昨日更差，今幸出院，并无危险，然就现状而论，一成希望，尚为勉强。今日不必书方，先以黄芪6两、党参2两服之，如毫无转机，则无办法矣。若得半点进步，可另进药。”同人以为药量过重，商请陆医师可否略为减少。陆医师说：非如此不可，时不待人，稍纵即逝，万勿犹豫。”大家遂同孙中山家族商量，征得同意后，照数煎药，当天下午给服半剂，晚间孙中山熟睡5小时，第二天上午（2月17日）又服半剂，大便通畅，小便亦利，脚肿消退大半，体温、脉搏、呼吸等皆有进步。9时许，陆医师来，诊脉后面露喜色，说药已有效，当即书写药方如下：黄芪8两，黄芩、党参5两，麦冬、沙苑子。大家心情这才稍为宽慰，暗暗祈祷在孙中山身上能出现奇迹。

最后时刻

当天，德医克礼亦来诊治，认为孙中山情况较好或系注射樟脑玛非之效。嘱继续注射，这天晚上孙中山熟睡了8个小时，在此期间，孙中山每天只食从协和医院取来的牛肉汁，其他饮食少进。一次忽然想吃葡萄，结果找遍北京城才买到少许，但他只吃了二、三枚，就不想再吃了。

2月18日，黄芪加至10两，诸现象均多进步，肿水全消。大家正暗暗高兴，不想德医克礼于上午11时诊后却说：

“虽先生病状转佳，然勿以小愈遂抱乐观，肝部渐大，必不能治，终成绝望。”大家听后，心中凉了半截。

2月19日、20日，因孙中山腹泻而减少药剂。陆医师诊治后说，病人已不受药，十分悲观，嘱以轻剂进之，认为可能已无法挽回了。22日起，孙中山停止服用中药，自此病情便急转直下。

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孙中山在忍受剧痛和病魔作顽强斗争的时候，仍念念不忘国事，当他获知东征军已克复潮安、汕头时，十分欣慰，”嘱汪兆铭电告胡汉民，“不可扰乱百姓”。2月24日，孙中山感到生命垂危，在神智尚清楚的情况下，口述了三份遗嘱。一份是留给国民党内的同志的，其文曰：“余致力国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。积四十年之经验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，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奋斗。现在革命尚未成功。凡我同志，务须依照余所著《建国方略》、《建国大纲》、《三民主义》及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》，继续努力，以求贯彻。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

平等条约，尤须于最短期间，促其实现。是所至嘱！”在孙中山口授的遗嘱中，原来是“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，共同奋斗”，担任笔记的汪兆铭因段祺瑞代表许世英曾来劝说不要得罪帝国主义，乃改为“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奋斗”。《致苏联遗书》是孙中山用英语口述，由鲍罗廷、陈友仁、宋子文、孙科笔记的，其中表示“希望不久即刻破晓，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，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，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。”

此外，孙中山还给家人留下了《家事遗嘱》，全文是：“余因尽瘁国事，不治家产。其所遗之书籍、衣物、住宅等，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，以为纪念。余之儿女，已长成，能自立，望各自爱，以继余志。此嘱！”

遗嘱写好后，本来当天下午孙中山就要签字，但听到宋庆龄在隔壁房间里很伤心地哭泣，便表示暂时不签了。事后，大家怕孙中山增加思想负担，再也没有人提遗嘱签字之事。直到3月11日，孙中山的眼睛已开始散光，经宋子文，宋霭龄、何香凝、汪兆铭商量后，才决定请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。

孙中山召宋庆龄、孙科等至病榻前，由宋庆龄托着孙中山的手腕，用钢笔在2月24日口授的家事遗嘱上签了字，这时宋庆龄泪流如雨，其他的人也禁不住哭了起来。后来又在另外二份遗嘱上签了字。当时围绕病榻的有孙夫人、何香凝、孙科、汪兆铭、张人杰等。下午，孙中山又召孙科，戴恩赛等至病榻前，嘱咐要善事宋庆龄。晚10时许，又召汪精卫孙科、陈友仁、喻毓西等至榻前，告以“本人此

次北来，放弃地盘，完全希望谋成中国和平统一，而欲促成国民会议，以解决国是。能达到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之目的，余虽死亦瞑目地下。”言罢，泪如雨下。孙中山得病后，自己言死还是首次，这时他气息上逆，喘息不止，病象骤变，昏昏睡去。

1925年3月12日清晨，孙中山醒来，在床上转侧频繁，状殊不安，语言已不能晰，医生为孙中山进枇杷汤少许，已不能受，多流出牙床之外，延至上午9时30分，一代巨人终于停止了呼吸，终年59岁。

孙中山的逝世，引起全国人民广泛深切的哀悼，各地隆重举行追悼大会，仅在北京中央公园（后改名为中山公园）举行公祭时，到孙中山灵前致祭的北京各界人民和外国友人，前后有74万余人之多，同年4月2日，孙中山的遗体移往香山碧云寺石塔时，整队参加送灵到西直门的群众达30万人，还有2万多人从西直门步送到香山：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、军人和工人。1929年6月1日奉安，遗体安葬于南京东郊紫金山南麓，墓地称为中山陵园，将衣帽封于北京碧云寺石塔中，称为“衣冠冢”。

毕生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死了，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的一大损失，但他的热爱祖国，随时代不断进步的精神将成为永远激励后人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。

宋庆龄的最后岁月

张戎·乔恩·哈利戴原著
傅伍仪·张爱荣 节译

编者按：本文系1987年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出版“孙逸仙夫人”一书最后的一章。原题“文化大革命和最后的岁月（1966—1981）”据译者言，翻译时曾在一些地方作了删节。

1966年宋庆龄73岁。这年5月，毛泽东正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，用1981年中国共产党对毛的评价的话来说，毛的理论认为“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代理人”控制了党和政府，全国已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”。所谓资本主义道路”，实际上就是把经济建设放在优先地位的通常道路。

“文化大革命的定义就是与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作斗争。”刘少奇和邓小平被定为“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”的头头，在他们下面的大多数各级干部被打成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

同传统的管理国家的路线一起，文化本身，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，都受到了批判，因为文化是以传统为基础的，而毛没有忘记他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中华民族的梦想。知识份子作为文化的集中代表被认为“最愚蠢的”。每个人都必须洗脑筋，因为没有人能避免受到旧文化的影响。

对毛的崇拜达到了最高峰。实际上，这正符合中国几千年来皇帝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具有绝对权威的传统。每个人和